

提 问 诸 子 丛 书

黄坤明 主编



提问商子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中西書局

提问诸子
丛书

提 问 诸 子 丛 书

黄坤明 主编

提问商子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提问商子/郭志坤,陈雪良著. —上海:中西书局,
2012.1

(提问诸子丛书 / 黄坤明主编)

ISBN 978-7-5475-0329-4

I. ①提… II. ①郭… ②陈… III. ①商鞅(前
395~前338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B226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4154号

提问诸子丛书

黄坤明 主编

提问商子

郭志坤 陈雪良 著

责任编辑 李琳

装帧设计 梁业礼 王轶颀

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(www.shwenyi.com)

中西书局 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(200023)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90×980毫米 1/16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75-0329-4/B·024

定 价 38.00元

总序

读诸子百家书，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：善于提问。“孔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(yì)》）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。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，提问频率之高，问题触及面之广，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：都说孔子知礼，怎么还提问不断呢？面对发问，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：“是礼也！”其意是讲，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，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！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。“三十而立”后的数十年间，无论是教学弟子，还是答问友朋，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，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。在诸子中，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，用司马迁的话说，是“学者宗之”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，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。

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会使人兴奋，使人坐卧不安，使人有索解的欲望，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。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。任何一个人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，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“永动机”。

我们常说，理论始于问题，科学始于问题，我们又何尝不可说，学习始于问题呢？

我们常说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，其价值也往往更大。善于提问，敢于提问，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。

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，孔子等先哲倡导的“提问”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。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。为何不把先哲请到“前台”进行访谈呢？他们的身世如何？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？为了传播学说，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？说是学习，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？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“书本”？他们四处游说的学

术主旨是什么?……甚至他们穿的服饰、吃的食品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、有滋有味的问题。

有鉴于此,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“提问诸子丛书”。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、通俗流畅的语言、富含哲理的剖析、见解独特的解说、图文并茂的装帧、考之有据的典章、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。我们所做的一切,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。

黄坤明

2010年春于杭州

提问商子

前言

商鞅其人，无疑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依靠明君秦孝公的支持，凭借着秦这块广漠的西陲之地，带领秦国百姓出演了威武雄伟的历史变革剧，一度在秦国出现了“妇人婴儿皆言商鞅之法”（《战国策·秦策》）的壮观场景。正是这一场伟大的变法运动，把一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“戎蛮之国”，建设成为大大走在山东诸国前头的“山林川谷美、天材之利多”的富国、强国。商鞅死后百年，即公元前 221 年，秦灭六国，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。“商鞅虽死，秦法未败。”一些史学家认为，“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。”这应该是不争的史实吧！

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官。然而，历史的公正需要时日的考验，这种考验常常会长达千年，乃至更久。自太史公司马迁裁定商鞅“少恩”、“天资刻薄人”以来的两千余年间，其人“一直蒙恶名于后世”（章太炎语）。两千年间，言其滥用严刑峻法者有之，言其开人君纵恣专横霸道之统者有之，言其发明告奸连坐法实施法西斯统治者有之，言其“轻罪重罚”弄得人人自危者有之。这样一来，“学者耻言商鞅”，“商鞅之名，在天下如蛆蝇粪秽也，言之则污口舌，书之则污简牍。”（苏轼：《论商鞅》）这些批评当然不全是空穴来风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些非议也反映了商鞅理论的某些致命缺陷。但是，历史最忌的是以偏概全。如果以商鞅的某些缺陷来描述和统领其人，把商鞅彻底妖魔化，那既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和公正，又难以向商鞅的历史亡灵做出交代。

现在是到了该对商鞅这样巨功与显恶同在的复合型人物，做出公正而切合实际的评述的时候了。好在有由商鞅及其后世学共同编定的《商

君书》传世，好在有关于商鞅的诸多典章文献存世，我们相信，历史是会还商鞅以一个清明之身的。经过大家对种种史实的过滤和审视，一个真实的、立体的、鲜活的商鞅将会重现在中华史册上。

郭志坤 陈雪良
2010年11月8日

目 录

第一章	悲喜人生	1
第二章	矢志变法	35
第三章	农战为本	65
第四章	修政作壹	107
第五章	千秋功罪	131
后 记		147

第一章

悲喜人生

商鞅的一生充斥着传奇色彩。如果把他一生的传奇故事实录下来，那肯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，让后世的人们为之动容。

商鞅一生的传奇色彩可以用“悲喜人生”四字来加以概括。商鞅生活在千载一时的大变革时代，前有吴起、李悝这样一些杰出的法家先驱，并世的有孟子这样的“善养浩然之气”的思想大家，稍后便是赵武灵王的“胡服骑射”。商鞅生逢变法迭起的大时代。身为这样一个大时代骄子，岂不可喜？商鞅作为一个变法志士，西入秦地，恰遇同样胸怀变革之志的孝公，志同道合，鼎力襄助，破除重重险阻，在秦国实施了一系列变法举措，岂不是喜上加喜？

然而，商鞅的人生历程又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。在前进的历程中，每一步都是阻障和重压。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”他的刑太子师，进而加刑于秦公子，都为其“车裂以徇”的人生结局埋下了伏笔。可以说，悲愤、悲凉、悲壮，一直伴随着商鞅变法事业的全过程。

我们知道，您的母国是卫国。出生于卫而又姓卫，可见您与卫国的公室算是一家人了。卫国是西周初分封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诸侯国，第一任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，定都在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，后来迁都到楚丘（河南滑县）。在这个国家存在的近千年时间，卫国一共传了35个国君。到您商鞅生存的那个年代，卫国已经沦为三等小国，与强大的魏国有着某种臣属的关系。史书记载说：“是时三晋强，卫如小侯，属之。”这些我们都是清楚的。后来读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，太史公一开头就在文中介绍说：“商鞅者，卫之诸庶孽公子也，名鞅。”我们对何谓“庶孽公子”了解不够，请明示，可以吗？

商答：正像你们了解的，我出生时卫国已很不景气。但是，正如俗话说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据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记载，我的祖父是卫慎公。慎公当政四十二年卒后，由他立为太子的一个儿子继位，那就是卫声公。声公即位十一年后死去，由他的儿子继位，那就是卫成侯。我当与卫成侯同辈。“成侯十一年，公孙鞅入秦。”我与卫成侯同为慎公的孙辈。

明白了这些，就可以说一说“庶孽公子”这个称谓了。作为侯国的国君，当然是妻妾成群的了。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数，正宫生的儿子，称为嫡子，而妃妾生的儿子，名为庶子，也有称为庶孽子的。《春秋公羊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何休注：“庶孽，众贱子，犹树之有孽生也。”树有主干，有分孽枝。正室之子如树之主干，妃妾之子如树之分孽。国君的正宫生的儿子，直称公子，一般而言太子（国王接班人）是在若干位公子中选立的，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应由长子充任太子的，除非长公子有过或天亡则另选他人。而妃妾生的儿子像树上的分孽枝一样，是“贱”一等的，故称“庶孽公子”。我是卫声公众多妃妾所生公子中的一个，由是被称为“卫之诸庶孽公子”。



《史记》书影

《春秋公羊传》书影

《春秋公羊传》，儒家经典《春秋》经的三传之一。上起鲁隐公元年，止于鲁哀公十四年，与《春秋》起讫时间相同。相传作者是战国齐人公羊高。该传起初只是口头流传，西汉景帝时，传至玄孙公羊寿，由公羊寿与胡毋生（子都）一起将《春秋公羊传》著于竹帛。《春秋公羊传》中保存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史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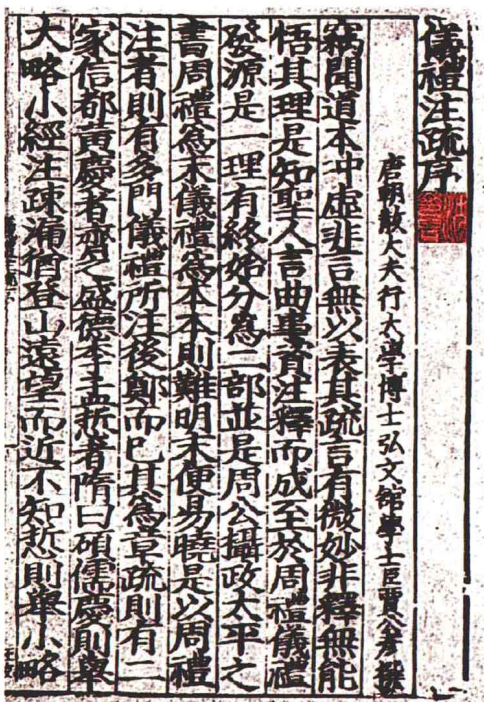
太史公在《史记》中时而称您为“卫鞅”，时而又称您为“公孙鞅”，您究竟是姓“卫”，还是姓“公孙”呢？查《仪礼·丧服》，上面的说法是：“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称公孙。”可是，上面说到您的祖父卫慎公从地位上说已降为“小侯”，已算不上是诸侯了，为何仍以“公孙”称之呢？有学者以为那是司马迁的一个误称，另有一些学者为了使“公孙”之姓名正言顺地成立，还与有些史籍上说的“公孙氏”是黄帝一脉拉扯上关系，说您实际上是黄帝子孙。这样的众说纷纭，倒使人莫衷一是了。先生，您是当事人，您以为何种说法较为合理呢？



司马迁像

商答：卫国到卫慎公时期，的确已经降为屈从于强大诸侯国的小侯，难以用诸侯名之了，事实上当时的诸侯之盟会也早已不邀卫国君参加了。上面引述的《仪礼·丧服》上的说法是对的。但是，随着时日的迁移，人们的观念在变。初始时，“公孙”的确严格地指的是诸侯之孙，后来就大大泛化了，凡是贵族后裔而又在社会上声名卓著的，人们会称之为“公孙”。这既是尊崇，又是客礼。可见，

说我姓卫，称为卫鞅是可以。同时，说我姓公孙，称我为公孙鞅，也是可以的。公孙鞅是人们对这个有作为的“庶孽公子”的尊称，而卫鞅当是一种实称。有些学者说公孙是黄帝一脉的姓氏，因此又把我与黄帝后裔拉扯在一起，虽说是远了些，但也是事实，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！



《仪礼》书影

还有一个问题，也一并在这里问了吧，除了上述两种称谓外，现在为何人们又称您为商鞅呢？为何总是说“商鞅变法”，而不称“卫鞅变法”呢？难道“商鞅”这个名号是非得与“变法”挂钩在一起的吗？



商答：说对了，商鞅这个名号完全是变法的产物。“商”是我商鞅入秦以后实施变法取得很大成效后获取的姓。“（变法）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”又带领大军打败了强敌魏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秦封之于商十五邑，号为商君。”商是当年周天子封的古国（河南商洛县一带），地盘不大，但位置相当的重要。商君的“君”，是一种尊称。《礼仪》：“君，至尊也。”郑玄注：“天子、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，皆曰君。”把这时的我称为“商君”，既是一种极高的荣誉，又是以其封地为依托的（按古制，没有一定封地，声誉再高也不能以“君”名之）。中国历来有以封地为姓的传统的，后人以我被封的“商”地为我姓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郑玄像

郑玄，东汉末年轻学大师，他遍注儒家经典，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，使经学进入了一个“小统一时代”。他尊称商鞅为“商君”。

商鞅雕像（商鞅广场）



知道了您的姓名以后，我们还很想知道您的生卒时间。您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常常模模糊糊，比如墨子、老子、庄子等，都很难有确切的生存时间可界定，据我们所知，您也存在那样的问题。许多学者都是依据某历史人物的某一坐标式的事件，再通过合理的推导，大致地勾勒出人物的生平行状的。请问：在您的一生中，有哪些确定无疑的坐标式的事件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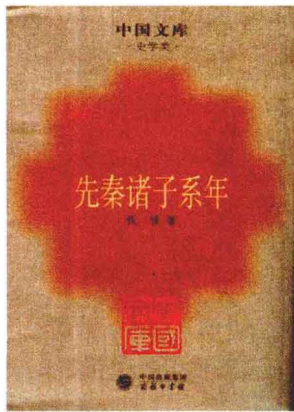


钱穆像

商答：我的生年虽然有点模糊，但我的卒年以及我的重要行踪的年代都是确定无疑的，也就是说，都有坐标式的事件可资佐证。这一点我比老子、庄子等要清晰得多。比如，我入秦的年份，那是可以肯定的，也就是秦孝公颁发《求贤令》的那年。秦孝公颁发《求贤令》史书上明确标明是在孝公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360年。孝公在位24年，死的那年是公元前338年，就在那一年，我被新登位的秦惠文王处死的。

有了入秦和死亡这两个时间坐标，我的一生的生命历程也就可以较为精确的加以匡算了。钱穆先生在《先秦诸子系年·商鞅考》中认为，如果假定我入秦时是30岁，那么我该是生于公元前390年的。这个设定如果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我一生是活了52岁的。这一设定受到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首肯，简直可以说是成了一种共识。我也认为那是大致符合实际的。

钱穆作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
(商务印书馆)书影



说到商鞅的生年大致上可定为公元前390年，突然在我们的脑际跳出另一个大思想家孟子，学者也大致上考定其生于公元前390年。两人真可说是当时并世的思想界两颗巨星了。可是，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：两人一生于鲁国的邹地，一生于卫国的王城，可说是毗邻而居了；两人后来都到过魏国，接触的是同一个魏惠王（即梁惠王），可是，在您的煌煌巨著《商君书》中，为何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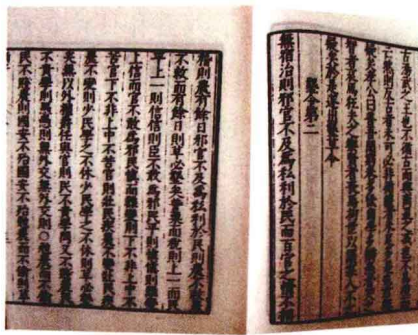
商答：这一问问得好，问到了点子上了。从中可以窥见我的变法学说的特征。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：在我的《商君书》中，不只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，对其他的所谓诸子我也大都不着一笔。为何那样？就是因为我根本上反对学者之间的无休无止的辩论，尤其是反对孔孟儒家之徒的那一套。我在《商君书》中多次表明了观点。我在《垦令》篇中写道：“国之大臣诸大夫，博闻、辩慧、游居之事，皆无得为。”我认为，孟子这些人到处与人“辩慧”，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，到处“游居”说事，我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四个字：“皆无得为。”就是你自以为是在“作为”，实际上是根本“无得为”，我认为就是“为”了，也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。在《农战》篇中，我更尖锐地指出：“务学《书》、《诗》……民以此教者，其国必削。”在这里我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等学者的诗书礼仪之教，那么，我对并世的孟子等人的不着一笔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《商君书·垦令》书影

此篇共分两个方面内容，一是有关“垦荒法令”的内容，共有法令二十条；二是对法令的论证和解释。



《商君书》书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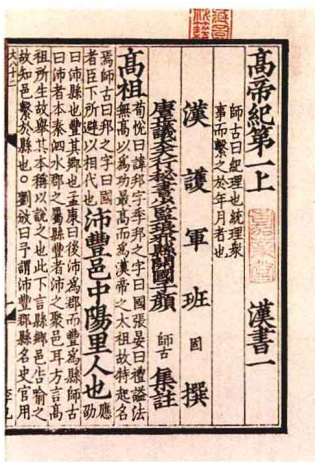
您一生只活了 50 来岁，就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只能算是“中寿”。您用这有限的寿数，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一番大事业，这是令人敬仰的。可是，班固等人又说您是“衰周之凶人”，语带讥刺之意。如果要您对自己的一生作回首的话，能不能概括出若干的阶段来？

班固像

班固，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史学家班彪之子，潜心二十余年，修成《汉书》，他说：“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。”又说商鞅是“衰周之凶人”（《汉书·叙传上》）。

商答：已经有学者给我作过大致概括了，

称之为“商君人生十步曲”，我想书写在这里，供读者参考。这十步曲是：第一步是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这是人生迈出的第一步；第二步是“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”，在魏国大约有十来年的时间，初步显示了我的才华；第三步是毅然“西入秦”，求见正在“求贤者”的秦孝公；第四步是舌战群儒，“定变法之令”，实施第一次变法；第五步是“立木取信”，争取广大民众支持；第六步是严惩违法者，积极推进变法；第七步是孝公封我为“大良造”，给予更大权力。迁都咸阳，实施第二次变法；第八步是以计大败魏军，孝公封之于商十五邑，号为“商君”，事业达到顶峰；第九步是应答赵良批评，对其劝阻表示不能接受，决然涉险前行，将改革事业进行下去；第十步是孝公亡，公子虔“发吏捕商君”，“车裂商君以徇”。



《汉书》书影

《汉书》，又称《前汉书》，为班固所撰，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，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说：“秦用商鞅，连相坐之法，造参夷之诛，增加肉刑、大辟，有凿颠、抽肋、镬烹之刑。”这样就使不少人对于商鞅的印象就是一个酷吏。

这人生十步曲，蕴含着的是“悲”、“喜”两字。其中有大悲，有大喜，亦有大悲与大喜的交织。不管是“悲”也好，“喜”也罢，都是与我执著而矢志不渝的品性相符合的，因此，不管后人怎么评说我（特别是包括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对我的批评），我的自我感觉是：我这一生过得值！下面让我们一起对我的“人生十步曲”作一点简略的回顾吧！

您人生的第一步是为日后的事业打下思想和学业上的基础。按照司马迁的说法，您是“少好刑名之学”，而后世不少学者又认为您不仅“好”刑名之学，对于黄老之学、儒学，以至于会通诸子百家的杂家之学都有所“好”，简直是广有所“好”，您说呢？

商答：我同意“广有所好”说。在那样一个千帆竞发、群雄蜂起的大变革时代，单是掌握某种单一的学问，是难以自立于世的。有所侧重可以，但决不能单一。我的广有所好，在一些历史资料和一些学者的评述中也有所提及。著名学者林剑鸣在《秦史稿》中明确指出：“商鞅对战国时各派的理论主张均有所涉猎。”“有所涉猎”的提法好，不是什么都专精，而是都触及了，可以说我是个博学者。

较多的学者认同，我曾向鲁国人尸佼学习过。尸佼可能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颇有地位的学者，也有著作传世，后来不知何因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，连身世都难以追寻。这样的情况在当时似乎相当普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《尸子二十篇》列于杂家类，而杂家的特色正是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。我向这样一个博学者学习，受益是很大的。后来我在会见秦孝公时，我既说以帝道、王道，又说以霸道、强国之道，充分反映了我刺取百家的本色，也可见我学问根蒂之深之广。如果读者诸君愿意去读一读我的《商君书》（原为 26 篇，现存 24 篇），那可以看出，我的许多主张都是霸王道杂而有之的。当然，在我所学之中，还是以法家学说为主，也就是司马迁说的“鞅少好刑名之学”。我什么都“好”，但“好”中特好的当是刑名之学了。



林剑鸣像及《秦史稿》书影

林剑鸣，著名秦汉史专家。著有《秦史稿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简牍概述》、《秦国发展史》等，他认为商鞅知识广博，吸纳了先秦诸子各家思想。



《尸子》书影

尸佼，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先秦诸子百家之一。他明于刑名之术，被称为“尸子”。《尸子》中提出“四方上下曰宇，往古来今曰宙。”这是沿用至今的“时空”概念。



《商君书》（中华书局出版）
书影

我们听懂了。说您在学习中单科独进是不当的，说您各科齐头并进也是不妥的。在学习的总体系中，有一门主科，那就是您在《商君书》里所说的“刑名之学”。先生，您能否对这门学问给我们作一点解说？

商答：当然是可以的。刑名之学，相传脱胎于黄老之学。“刑”，通“形”。也就是强调事物的“名”，要与事物的“形”相匹配，不能名不符实。后来，战国时的申不害、李悝一派，主张“循名责实，慎赏明罚”，把“刑”与“名”用于经济生活、军事生活以至于政治生活，这样，刑名就更多的具有“法”的意味了。我学习的正是这一学说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法家学说。“法令者，民之命也，为治之本也。”（《商君书·定分》）这是我长期学习刑名之学后得出的最终极结论。



老子像



庄子像